

关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与教学法关系的思考*

苏长和**

[内容提要] 本文阐述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政治学教学法关系的一些问题,首先从古今中外知识格局演变的角度,阐述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各大文明地区中的意义。古代中国有一套自己的治国理政知识体系。当代中国开创了伟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在政治发展和实践上积累了丰厚的政治学资源。作为一个世界政治大国,中国自然也有与之相称的政治学知识宝藏。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会带动政治学教材的教学育人改革创新,依靠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就能解决好“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这么教”这一新时代政治学的育人问题。本文最后还提出中国政治学者要重视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教学教材育人中,加强对中国政治学知识原创性成果的认定和推广、使用的建议。

[关键词]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政治学教学;中国政治学知识

建设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复旦大学政治学学科“十四

* 2022年8月1—5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办了“中国政治学教学法讲习班”,邀请了学院政治学、国际政治、公共管理重要基础课程的教师讲授课程教学理念、方法等。本文由作者根据其在讲习班开班式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

**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院长。

五”规划中重中之重的任务。中国特色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实际上于 2016 年就已经被列为复旦大学政治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第一个重点方向。我们做这个工作,固然是回应国家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要求,同时,建设复旦政治学学派,也是几代复旦政治学人的愿望和目标。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要围绕两块展开:一是自主知识体系研究,抓手是编辑出版“政治逻辑丛书”和集中体现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成果的多卷本《政治学手册》;二是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贯穿到教学教材育人中,抓手是“中国政治学教学法”。这次学院主办的“中国政治学教学法讲习班”,就是我们第二块工作的内容之一。

我的报告围绕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教学法关系来讲。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从历史和当代世界知识格局看知识体系;第二,大变局时代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第三,自主知识体系和教学法关系问题;第四,珍惜及加强运用中国政治学知识的原创性成果。

一、从历史和当代世界知识格局看知识体系

其实,每个伟大的国家或者文明都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但是世界上将近 200 个国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必要搞自己的知识体系。我认为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家,其国内状况根本没有复杂到能够产生很多问题以及产生很多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案,以致会形成一个知识体系,所以我觉得这类国家不可能也没必要搞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样说并不是对这类国家的不尊重,而是知识体系形成的规律如此,我们应该尊重知识体系构建的规律。但在文明和国家高度重合、社会高度

复杂到产生各类问题并且会产生多样选择方案的国家,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具备知识体系生成的必要土壤。这涉及我们如何看世界政治的视角。过去很多时候以国家为视角,这个本身没有错,因为我们生活在主权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的世界中,但是仅这样还不够,还需要引入“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如果以文明国家来看世界的话,视野就会不一样。从知识体系意义上讲,世界上称得上“文明国家”的国度,都有或者历史上有过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套体系对文明和秩序的稳定和内源内生发展很有意义。

人文社科的知识体系,说到底还是表明对自己以及世界怎么看?为什么这么看?对于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集成为一套由自洽概念和逻辑构成的认识体系。在政治科学世界中,特别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领域,这套政治学知识体系往往又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内/国际政治的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彼此各得其所,但又相得益彰。所以,政治学知识体系是学术的,但同时又是政治的,它需要直面政治或者现实政治的问题,我们过去将其称为“政统”,当代中国政治的“政统”则体现在我们的党章和宪法中。一套政治学知识体系将天下太平、国家精神、政治信仰、制度安排、治理之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贯通集成于一体,乃至进一步转化到政治教育教化中。它可以为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提供思想和精神支撑,是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粘合剂。

我们阅览古今中外诸多方面的重要的政治学著作,其背后其实都有一套维护“政统”的叙事和哲学,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近代西方、古代中国、当代世界等,均概莫能外。各类政治学知识体系始终要解决关于“一”和“统”的问题。换句话说,政治学知识体系需要为国家或者一个文明树立一套政治价值和政治标准。政治价值和政治标准问题解决了,内部政治稳定和秩序的共同思想基础就有了。当然,讲“一”并不是反对“多”。但是现代政治似乎认为多元就是好的,一统就是不好的,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即使在

现代政治中,没有以“一”为前提的“多”,也不会有政治秩序,今日欧美世界由于忽视“一”而突出多元,由此带来很多政治弊病。实际上,我们阅读西方主流政治史著作,不管什么政治思想学说,它的“一”和“统”很清楚,无非是希腊、罗马、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然后20世纪这个“统”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有时被统称为西方精神,或者西方传“统”。比如,我们讲20世纪比较流行的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学说,大致构成了西方的“政统”叙事,其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历史线索叙述的。那么这样的政治史叙事或知识体系确定了什么标准呢?就是西方政治和制度中心的标准。有了这个知识体系以后,它又衍生出很多叙事模式,比如说现代化叙事模式、民主化叙事模式,延伸到世界政治,就是一度流行的自由国际秩序那一套。这是自由秩序模式的政治叙事。这套叙事模式背后隐含的假设是,西方那一套制度和思想是先进的,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思想在整个世界政治国际关系中意义不大;其他世界的政治发展应该朝着西方自由政治经济秩序那套模式去;凡是不符合这套标准的,就是“逆流”;凡是符合这套标准的,就是“大道”。以古代中国政治话语来解说西方政治发展的话,这就是它们希望实现的“天下大同”模式。

我前些年翻阅《统治史》一书,其实这本书名应该译成《政府史》。我看它的叙事最后就落脚到议会民主和现代国家。书中说现代国家有两个:美国和法国。是这样吗?《历史的终结》一书的叙事也是这样,有一套背后的知识体系和标准为支撑。美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讲自由国际秩序,也比较武断,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自由世界和非自由世界。像罗尔斯这样的学者,为了服务美国这套世界秩序政策,使这种说法显得学理一点,将世界分为“三个世界”:一个是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一个是得体国家组成的世界,还有一个是专制和独裁国家组成的世界。这是西方知识体系支撑下形成的世界政治叙事,后面讲的亨廷顿的民主化世界政治叙事也

是。所有这些著作内容和主题虽不一样,但是道理都一样,万变不离其宗,明白了我们就可以化繁为简,不为其所束缚。当然,自由国际秩序有时既不自由也不国际,可能只是一个小范围的秩序。俄罗斯人把它名字给改了,也就是将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改成“liberal interventionism”,叫作“自由干涉主义”。因为这类秩序在外在延伸时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当假设自己代表政统、别人不代表政统的时候,必然产生强烈的冲动去改造甚至干涉别人,给其他民族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痛苦。这种做法恰恰是违背自由原则的。不管怎么样,西方世界内部有一段时间形成了政治叙事的“一”,其也有多元叙事,但是多元叙事不能撼动和挑战这个“一”,这是他们的政治规矩。这套政治叙事一度在世界上很流行,被视为不二选择,但是后面我们会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随着世界政治的巨变出现了政治叙事的知识竞争。^①

回过头来看,其实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知识体系。阅读中国古代通典、通志,还有很多会要体的书,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有一套自己的政治概念、逻辑和分类的办法,形成了一套清晰连贯的政治叙事,发挥了政治知识体系在安邦定国、长治久安中的独特意义。像天下、家国、君民、王霸、义利、礼法、华夷,等等,这一套体系形成以后,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继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用博、大、精、深四个字概括我们古代知识体系的特点。记得20世纪80年代时流行一个概念,说我们古代封建社会呈现“超稳定结构”。“超稳定结构”更多是从经济政治含义定义的,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解决了政治道统问题,确立了完整的、连贯的、不断被结构性继承的政治叙事和政治知识体

^① 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解放”主题的阐释,为人类提供了一套人类从生产开始、以解放为归宿的最有力的政治叙事。自由只是这一政治价值序列的一个环节。现代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将抽象的自由作为话语建构的一个核心概念和关键命题,日益显示其知识体系的贫乏。

系。这套政治叙事和政治知识体系,同时通过教化转化到民俗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好地交融在一起。当然,我们现在叫那套知识体系为“封建知识体系”。对比起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说,西方社会内部政治一直比较稳定,如果用中国的概念讲西方政治发展,就是一段时间西方社会内部也有一个超稳定结构。它们形成超稳定结构,一方面得益于其神学政治解体后,政治上重新解决了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这个问题。即20世纪时其核心知识分子集团通过对民主话语、自由民主话语的改造,确立了新政治叙事。当然了,现在它们(西方世界)内部在社会政治以及对外关系方面也碰到问题,“是否能够维持稳定”成为其内部政治中的一个棘手问题。一定意义上,如果西方内部出问题的话,一定是其政治学理论、政治学说和政治教育出了问题。不管怎么样,对于整个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我们同样可以像概括古代中国政治知识体系一样,用博、大、精、深四个字进行概括,要承认其贡献,但是必须看到其局限,乃至给予切实的批判。

另外我们再来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部,它要形成超稳定结构也需要解决政治道统和知识体系叙事的问题。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处于探索进程中,二战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自觉和独立意识很强,但是现在它还处于自身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之中,在整个世界政治知识格局中,它还处于边缘。总之,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文明地区或者文明国家,它就一定要在政治上解决“政统”这个叙事问题,这是前面我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也是几千年前政治学经典著作《尚书》所强调的。

当然在历史上道统和叙事有可能来自不同的政治知识资源。在政治学知识格局中,有的知识体系主要来自宗教,或宗教和世俗的糅合,例如即便我们阅读现代西方政治学著作,也能看到不少政教不分的内容,虽然西方政治学教科书告诉人们,经过宗教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西方政治实现了政教分离。对之,人们不能只看其

书上怎么说,还要看现实政治仪式和政治生活。就此来说,当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知识资源来自古代中国优秀的治国理政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理论成果以及当代中国伟大的政治实践和创造。这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思想根基。任何类型政治学知识体系,原理上都要确立政统及其叙事。一套政治叙事,不是简单地讲故事,它一定有一套概念和逻辑。政治叙事应该讲清楚内部的法律、政治、制度、秩序、人民等概念,也要讲清楚它跟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讲清楚内外政治,能够说明它自己的政治和外交哲理,赋予政治以合理化、理想化力量。同时它还不是高高在上的,它能够转化、普及到国民的政治教育中去,从而起到凝聚大部分人、形成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的作用。这就与我后面要讲的教学法主题联系在了一起。

这是本文第一部分,我从古今中外比较的视角来谈知识体系在政治秩序中的意义。这个视角是古今中外“会通法”。^①

二、关于世界大变局时代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也一直面对着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我们各个大学的政治系老师在讲中国政治学历史的时候,都会知道,当时他们所在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和政治学教研室是被视为一体的。那时关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有一套新的叙事,也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史叙事,讲中国的历史是这样,讲世界的历史也是这样,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叙事。在这套

^① 有关“古今中外法”,参见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

历史哲学主体下,也有一套关于世界政治的叙事。有“三个世界”的叙事,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叙事,有反帝反霸反殖、建立新世界的叙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学文科各个院系都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各学科理论研究,涉及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历史学、世界历史、文艺理论,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当时我们形成了一套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所以,有人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是不准确的。就知识体系而言,一是我们古代有,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各个人文社科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深化普及到政治教育中。差不多198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大部分受惠于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很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6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以及2022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讲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可以出理论而且一定能出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可以出思想而且一定能出思想的时代。”另外,各位高校一线教师都有感受,这些年中央特别重视教材问题,将教材提高到国家事权的高度,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的高度,说明中央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我这里强调一句,就是教材是国家事权,政治学教材更是如此。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治大国不重视这个,凡是不重视的,将教材建设和评价体系拱手让给别人,最后其在政权和政治上没有不栽跟头的。

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美的学问被大规模介绍进国内(进来的时候打着“国际学术标准”的名义,很有迷惑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建设得不够,各种因素导致在一些学科

领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意义上失踪、失语、失声,^①社会思潮出现多元化趋势和态势。前面说到,我们搞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都明白,在任何政治社会里面,多元并不是绝对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秩序,它一定要处理好“一”和“多”的关系:要“一”中有“多”,不能“多”中无“一”,没有“一”只有“多”,往往容易导致无序。那种认为“一”就是不好,“多”就是绝对好,是政治正确,这是很偏颇的。在世界政治中,欧美最近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了,栽的什么跟头呢?走到多元主义和个体自由主义的极端,它内部的“多”要取代“一”,或者“一”在式微,因此出现社会思潮的混乱和动荡,开始反思绝对的多元主义。这是亨廷顿和欧洲的一些学者一直担心的。对我们来说,各种学术流派纷呈当然是好事,但是主流的、主体的知识体系是什么?主流的、主体的知识体系是不是被大多数学人自觉地、一以贯之地认识并实践?这些有时还真要打上问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宪法和党章规定的,那么我们作为人文社科研究和教育者,是不是做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现在几乎每个学者都认识到构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阅读很多期刊文章,其基本还是欧美理论-中国经验这样的写作和论证模式。我们很少有用我们创造的理论去把别人作为案例和经验检验的论著,不是外为中用,而要中为外用,这说明我们还不是能动的解释者,只是被动的被检验者。

在当代中国,我们讲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有一个交汇期,这个交汇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定型的,能为自己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提供稳定的解释的系统,为中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服务?认真琢磨起来,我们这方面还是存在不足的。因为存在不

^① 习近平:“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足,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政治和外交有很多了不起的实践和创造,但是学理化、知识化、系统化、普及化做得不够,有时感觉有理没说出。所以,有时候会发现,人们在一些大问题上,看法有分歧。对我们制度、政治发展、外交、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一整套政治外交实践成果,坦率地讲,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在这一块,不是将所有的问题在理论上都说清楚了。如果说不清楚,怎么谈政治自信和学术自信呢?进而言之,如果没有自己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有的时候在面对外来政治知识的时候,有人就会缺乏鉴别能力,缺乏免疫能力,很容易被别人带着走。我们自己是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可能也是这样。

古代中国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政治上是很骄傲的,就如前面说的,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成熟的政治知识体系。当然,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其实在政治文明和政治创造上很自豪,很多中国学者在骨子里是不认西方那一套的,觉得那一套政治文明不代表人类对更好政治追求的方向。所以大家会看到,西方的制度文明扩张到东亚的时候,它就停止了。这就说明,我们社会和政治中一直存在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始终存在的不自觉地要构建自己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那股力量,它对另一类政治文明的扩张形成了强大的抵抗。我认为这种抵抗对世界政治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人类探索更好的制度方案和政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可能。

三、自主知识体系和教学法关系问题

前面两部分讲自主知识体系。下面,结合自主知识体系,讲讲它和教学法的关系问题。

重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要同时重视以自己的知

识体系为基础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国际关系的教学法改革和建设。知识体系立起来了,其一定会影响到教学、教育、教材。教学法是什么?教学法就是要解决“怎么教”“教什么”“为什么这么教”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中,提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之问。^①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回答好总书记提出的问题,就要在教书育人工作中抓住“怎么教”“教什么”“为什么这么教”。自主知识体系和教学、教材、课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教学、教材、课程讲授的是主流、成熟、稳定的知识,其背后是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个并不排斥外来的知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最后要转化、普及,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教学教材体系进课堂,发挥自主知识体系的育人功能。

目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和教育大致分三块: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和教育,二是党的创新政治理论研究和教育,三是研究介绍西方政治学理论(由于受到西方政治学叙事的影响,这块有时误将西方政治学知识当作人类普遍的现代政治学知识)。这三块基本是分割的,有时在具体操作中甚至是对立的,学生在思想政治课上学马克思主义,但是一些专业课教学教材中的主要理论来自英美。学术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在具体研究议程和过程中,有时马克思主义、党的创新理论又被丢了,有人甚至为了迎合西方的社科口味和标准,一味地用西方民主理论来检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这说明目前的政治学研究和教育,与国家的期待还有很大落差。要克服政治学教育教学条块分割的缺陷,就需要将加快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政治学教育教学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这里我选择三个重要的政治学命题,讲一下自主知识体系和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10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参见《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教学法的关系问题。第一个是政治学中的“民主”，第二个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的“政府”，第三个是国际关系中的“现代化”。选择这三个命题，一是因为这三个命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二是因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和教学近几十年来在这三个命题上受到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影响大，人们或多或少习惯用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这三个命题提供的叙事和标准来阐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这样有时导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极大误读甚至误导。关于这三个重要命题的阐述，有些人好以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为参考标准，对此缺乏批判意识。而实际上，当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本来就在这三个命题上拥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体系，且这套解释体系能对外来的知识形成覆盖和超越的学术效果。

（一）民主

民主化叙事是当代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核之一。民主本来是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关键概念，本质含义是人民民主。美国战后通过对“民主”定义的系统学术改造，将西方政治中的多党制、利益集团政治、一人一票选举、三权分立等特殊知识，置换掉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含义，在政治叙事上将西方制度体系的特殊知识，用普遍性的民主概念进行表述。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个工作由三个或隐蔽或公开的部分组成：一是熊彼特、亨廷顿、达尔、福山等核心政治学者对民主概念进行改造，将代表西方政治制度核心特征的内容转换说成是普遍的标准、民主的标准，构造出一套所谓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二是这个知识体系建构工作完成后，将其转化到大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哲学等教材中；三是动用政府、社会组织、基金会、大学、媒体、评价体系（奖项的设立、学术议程的设置、媒体话语的强置）等全方位力量在国内国际进行战略传播和推广。关于民主化的叙事，亨廷顿讲的民主化“三波”（浪潮），学界都很熟悉。其实大家仔细一想，这个

世界上很多国家争取民族解放、争取独立,很多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奴役中独立,社会主义国家对好的政治的探索,包括我们国家一直在探索好的政治和制度,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化,大家看看这些进步因素,在亨廷顿的所谓三波民主化浪潮里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因为他背后有他的政治叙事标准,有一套他的知识体系。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这套叙事讲世界政治,那跟美国讲的基本上是一样的,还是在他的框架里讲。现在不少人在讨论新冷战,所谓“民主化”浪潮,也是过去文化冷战的产物,是冷战政治学的产物。^① 所以,我们的政治叙事对世界要有启蒙,如果顺着文化冷战的国际政治叙事讲,就会把自己不自觉地带入别人设置的陷阱中。因此,对一个解放的新世界,关于更好的世界的叙事恐怕不能够这样讲,而要把这个更多被遮蔽的进步因素呈现出来,把真正的世界呈现出来。

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也是中国在世界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一。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关系学科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民主的叙事如按照英美特色政治学,也就是希腊-罗马-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大陆-美国-几波民主化(民主-专制或威权二分)这个叙事来讲,最后会将中国政治道路引导到英美政治道路上。而如果马克思还活着,或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去考察美国及西方政治,他不会认为那套东西就代表着真正的民主,其话语体系应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回到马克思主义,回到中国共产党,回到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回到民主的本来要义,民主的叙事就是:人类各大文明早期的贡献——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民主理论及其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对其的超越(人民民

^① 这里主要内容摘自苏长和:《两种民主传统与中国民主的学术表达》,《红旗文稿》2015年第17期。

主)——社会主义运动——战后各民族争取民主、独立、自由的进步性——中国革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国际关系民主化(公道公正共商的新国际秩序)。

民主这个叙事涉及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各方面形成一致并共同发力,这些成果应该被转化到教学、教材中。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这样做?如果不是,应该怎么做,我们的认识需要一步步去改变。

(二) 政府

我们学院教师刚出版了一本书:《马克思主义政府原理的中国逻辑》,^①这是本研究政府理论和中国政治的书。当今流行的政府学说多从代议政府的逻辑展开。对于那套政府论的主要观点,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接受,奉之为政府理论的圭臬,鲜有批判和质疑。这些观点包括:政府为恶的假说,即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政府像理性人、经济人那样是自利的,会为自身利益考虑;政府应该是“小”政府,不干预、少干预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是对立关系;政府是否民主只能根据是否存在竞争性多党政治的定期选举来判断;由于受到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约束,政府的施政理念不得不在不同政党的理念间摇摆,本应守正持中的政府由于竞争性政党政治而被扭曲;受竞争性政党轮流执政的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常常因为党派政治而剧烈变化。

这里要问,这就是唯一标准的政府理论吗?我们是不是按照这种政府理论及其派生理论在教育我们的学生?如果学生都是这套理论教出来的,将来他们在公职机关工作了,会怎么样?我问这几个问题,都是与自主知识体系(政府理论)和教学法有关系的

^① 陈明明:《马克思主义政府原理的中国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问题。

中国政府理论的很多特点,有的特殊,有的具有普遍意义。第一,政之所要,在乎民心。传统的中国政治和民间认识并不会从政府天然为恶的简单假设来认识政府,而更多从政府的执政状况和民心向背来判断政府的优劣善恶,得人心、得民心的政府就是恪守政道的政府。第二,政府为公思想。政治以及政府是公和正的代表,政府应该是公道的政府。这与传统中国政治所讲的“天下为公”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的为公思想是相通和一致的,与多党制支配下政府只代表部分利益的理念截然不同。第三,由于政府本身就是公和正的代表,因此其肩负着仲裁判断的一部分法律职能。在中国政治理论中,政和法有时结合在一起,于是有了“政法”(注意不是“法政”)这样的政治学概念。第四,政府为民或人民政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所有国家机构的名称中均加上“人民”二字,突出的是政府为民思想。一个为公的政府否定了一些政治学理论中政府为私或者自利的假设,人民政府本身并不代表哪一党、哪一派、哪一部分人的利益,它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人民政府本身没有利益,因而不能根据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来理解和分析政府。第五,在当代中国政治中,中国共产党、政府、立法司法机关和监察监督机构是一个逻辑上的整体,这与现代西方政治的代议制逻辑中上述机构之间的分立制衡是不一样的。虽然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为了理解上的方便,人们会以狭义的行政部门的概念来定义政府,将政党、政府、立法机构和司法区分开来,但是在中国人民的习惯认知中,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司法机构均被视为人民政府的一部分,民众还会用“公家”来笼统地指代这些机构。第六,社会主义中国会限制、隔绝资本和政治之间的勾连,确保人民政府的公道性,保证政府不被利益集团政治俘获或绑架,制定和执行面向最广大人民的公共政策。这同很多国家中资本俘获政府的政治模式截然相反。第七,政府

和社会、市场是互补而不是对立关系,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关系,同时我们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有别于西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华盛顿共识”所推崇的极端“小政府”和私有化理念。政府不是越大越糟,也不是越小越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质量是衡量其优劣的关键标准。第八,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决定了中国政府必然且内在地是一个承担完全责任的有担当的政府。中国政府近乎无限的责任与多党制逻辑下的政府只会承担有限和部分的的责任形成了鲜明对照。对后一类型政府的问责经常因为政党轮替而被自动豁免,而且这种责任豁免还合乎制度程序。相反,在中国政治中,政府在理论上的责任还是跨代际的,其在行政上既要要对前代的政府行为负责,也要对之后的影响负责,因而政府的视野和规划要比选举政治下频繁更替的政府更为长远,行为也更为节制,并且更有担当。^①

说到这里,人民政府来自人民(*from the people*)、植根人民(*in the people*)、为了人民(*for the people*),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就是我们政府论中的经典政治学名句。我不是说这套政府论就很成熟,但其确实是中国人对政府的理解,有中国特色,也有世界一般意义,这些内容需要转化到政治学、公共管理教学和教育中。现在一些学生的论文写中国治理,上来就假设(受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以及公共选择学派影响)政府是自私的、恶的、小的、为利益博弈的,我们作为老师,是不是自己要反思一下?如果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进入党政机关工作了,那潜在的后果是什么?这里提这个问题,是再次说明自主知识体系与教学法关系问题的重要性。

^① 这里主要内容摘自苏长和:《世界需要新的政府理论》,《北京日报》2020年8月17日。

（三）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重要讲话中讲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2022年7月26—2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也讲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也是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对于政治学教学教育也很有启发价值。

社会科学教材教学中经常讲到现代化理论。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看待现代化道路,就需要将过去西方现代化道路模式的普遍性还原为特殊性,将真正的现代化道路模式予以普遍性。所以,概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做一些理论立标的工作,从而掌握我们关于现代化的叙事、定义权和解释权。为此,需要确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标准,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转化到现代化道路的一般性中进行叙事。这个工作也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了,它就被转化到我们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学的教学和教材中,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对政治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国际政治学科的育人来说,就是要增强学生学者的政治自信。

从普遍意义上说,人类现代化道路大致有如下四个标准。第一个标准,现代化道路是否实现了自身发展。过去西方实现现代化,一般我们称之为发达国家。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实现了自身发展。按照这个标准,中西现代化道路各有千秋。人们通常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将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类别。第二个标准,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成果是否为更多的人、绝大部分人所共享。按照这个标准,西方过去确定的现代化道路模式在一些国家内部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条道路存在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社会人口规模最大的群体的发展和共享,现在在

解决贫困问题后继续推进共同富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之所以如此,同我们“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关。在这个标准下讲中国现代化道路,我们会有政治制度的道义优势,就会促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下思考现代化道路。第三个标准,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国家发展的同时,不以侵略、掠夺、扩张、殖民别的国家为代价。或者国家间互不相害,和平发展。按照这个标准,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具有普遍意义,其历史上有很多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的事例,如果各国发展道路都这么走,对世界就是灾难。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世界上不输理;推而及之,各国如果共同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才有基础。在这个标准下讲现代化道路,我们就会有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道义优势。第四个标准,就是在实现自己发展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有的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一点上不符合这个标准。中国努力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这一点上,我们有道义制高点。

围绕这四个标准,各门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都可以作学理展开。同时,在国际传播中,有了自己的定义和标准,就容易进行比较和对话。这四个标准(或许还可以再丰富)是真正的现代化道路标准,具有道义性,不能说完全普遍地代表了所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类型,但是更多国家走这样的现代化道路,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就有可能,世界和平更有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有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们的发展政治学、国际政治理论关于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中,是否有我们自己普遍的标准来衡量现代化道路?既然我们反复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那我们的现代化理论是什么?在国际关系教学中,是不是对那种带来侵略和扩张的现代化道路要给予更多的批判?在批判中确立新的现代化一般标准。这些都

是在自主知识体系生产过程中,我们教学法的提高所要解决的问题。怎么教、教什么、为什么这么教,对之我们心中要有数。

以上讲了三个例子,推而广之,如以政治学原理这门课为例,欧美政治学原理是不讲党建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因此不讲了?中国政治学原理恐怕必须要有这一块内容。再如,政治学里还有民政,民政是中国古代政治知识很重要的一方面内容,实际上其他国家的政治也重视民政。大家注意到疫情期间各国治理的差异,疫情治理其实很大一块涉及民政思想。西方政治知识体系里没有“民政”这个概念,难道我们的政治学知识体系里就不要讲这个重要内容了吗?反过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民政来研究对方?现在人们大多喜欢使用欧洲的福利政治概念,但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民政概念与福利政治概念相比,无论在思想、内涵和实践哪方面都要更为丰厚。政治思想史(含国际政治思想史)也是如此,我们如按照欧美提供的几大流派来讲,那你写出来的书不会超过别人。但是我们可以把古今中外融合起来,写有我们自己理解线索的政治思想史,例如按照“天下为公”而不是“天下为私”政治哲学线索来写。比较政治学中是不是要引入“规模”这个关键概念?毕竟超大规模国家治理和那些人口几十万几百万的袖珍微型国家的治理不可同日而语。“追求权力”“无政府”是不是就如美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假设的那样是国际政治的本质?类似这样的反思性命题和建设性命题有很多很多,它们为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了很多创新创造的机会。

按照这个思路来思考自主知识体系和教学法的关系,就会将我们的视角和思路彻底打开。这在认识上是从“别人怎么说”到“我怎么说”的思想解放过程,从马克思所说的从以往教条的“重力思想”中解放出来。解放不正是认识自由的目标吗?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首要的是在一些重要学术概念、理论命题、学理逻辑等方面确立自己的解释标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党的创新理

论并不割裂,反而在道理原理上相通自洽;教学法的改革创新是将这些扎根本土的学问转化到教材教学和课堂中。由此,实现传授知识和育人的统一。当然,知识体系立起来以后,不仅会促进我们目前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政治的教学教材体系改革,还会逐步促进评价体系的完善。

四、加强对中国政治学知识原创性成果的认定和推广、使用

世界政治的知识格局在变动,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在知识层面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注定是一个世界政治大国,但是不是政治学大国?如果还不是,我们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国际政治学科能做什么?我个人觉得,构建我们的政治学、国际政治、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不是指与外部世界不来往了,要自搞一套。当然也不是“为了与国际对话,为了让别人听得懂,完全照搬别人的概念和理论,拿来就用,来构建我们的政治外交知识体系”。如果这样的话,最后我们生产的就不是自己的知识,只不过是别人的知识体系做一些添砖加瓦的事情。

在国别政治中,像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的国家治理,涉及很多本土的政治和行政知识资源。由于中国学人对国家治理的关注和重视,治理成为世界政治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议程。所以我们很多了不起的政治知识与实践,在英美的政治知识体系中很少被看到。研究非洲的学者告诉我,我们中国学者研究非洲,大致分两类,一类是用欧美的政治经济发展理论研究非洲,另一类是利用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概括的理论和概念与非洲学者交流国家治理经验。非洲朋友说,非洲学者对伦敦、巴黎、华盛顿提供的非洲发展学耳熟能详,他们最希望听的是第二类学者的观点和合理化

发展建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世界政治知识领域发生的现象。我们要把政治实践中的很多政治创造学理化、体系化,同时通过国民教育进行普及,从而树立自己的政治叙事和标准。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才能有政治自信和外交自信。

最后,我想突出讲一下一直被我们忽视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教学法关系中有关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原创性成果的认定和推广运用问题。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在广泛使用中让各方受益,本不能独占和垄断。但是人类历史中很多让人一目了然的标识性政治概念、理论,则有创造的“注册”和归属,以示对创造者的尊重。这方面至少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其一,在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我们往往将我们独到、独特、独有的政治创造,在文献综述中不自觉地归到外人那里。以“协商民主”这个概念为例子,我注意到不少中国学者研究此类主题的论著,将其溯源为美国学者最早提出这个概念。造成这种原创政治实践和知识成果流失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用中国独到、独特、独有的“协商民主”这个概念,去翻译外来的 *deliberative democracy* 这个词,久而久之,误导读者以为这个创造性政治知识是美国学者原创的,而实际上两者说的不是一回事。其二,在自主知识体系和教学法关系中,要重视对中国政治经典文献资源的阅读、保护和使用。在教学知识比重中,我们一度比较重视介绍外国其实主要是美西方的政治思想理论学术,但是,对构成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几大来源的知识重视不够,在课程安排、课堂讲授、教材建设等方面做得不够好。例如,对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经典政治、行政、外交文献及党规、党的文件在研究和教学中使用不够。既然做得不够,就应该着力去改善这种状况。这也是复旦大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政治学科在“十四五”期间拟建设当代中国经典政治文献选读、当代中国经典行政管理文献选读、当代中国经典外交文献选读三门课程的初衷所在。将构成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几大来源的经典文献的研究阅读,贯穿到教学育人过程中,从而切实保护好、使用好我们的经典政治学文献,这是一流学科在传承发展中应该承担的薪火相传的责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Political Knowledge System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 Reflection Approach

Changhe Su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suggestiv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knowledge system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begins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evolution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then reiterates the meanings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governance knowledge system. In current world, China need to develop its own political knowledge system to match its rising role in world politics, and it put forward that we need to frame the knowledge system based mostly on its rich political resources.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knowledge will promote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ells us to rethink what we teach, how to teach and why teach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paper also reminds Chinese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udents to protect Chinese political intellectual rights in their research and teaching areas.

Keywords: Chinese political knowledge system; political education; Chinese political intellectual rights
